

第一章 导论

在导论这一章中，我将对语言接触的概念、研究历史、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作简要的概括，以便为后面的论述提供必要的范围和规范。由于语言接触是一个新兴的课题，学术界对此的论述还很少，而且有的认识还不一致，所以本文的综述是根据所能找到的论著以及自己在研究中的一些体会分析、归纳而成。由于语言接触是由民族接触引起的，所以在这一章中还简要介绍阿昌族社会的人文情况。

第一节 什么是语言接触

本文所研究的“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不同语言由于使用的接触而出现的结构特点和功能特点的变化。

语言的变化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引起，其一是由语言自身内部规律的作用而引起的演变；其二是由外部接触而产生的变化。自身的演变是语言内部结构的变化，速度慢，它的变化主要反映在语言结构上，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这种变化可称自然变化，又可称常规变化(normal change)。而由语言接触引起的变化，一般来说比前者来得快、来得猛，其变化不仅体现在语言本身上，还体现在使用功能上。这类变化可称接触变化，又可称非常规变化(non-normal change)。本文研究的是后者。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人与人的接触和交往只有通过语言这一重要工具，思想才得以沟通，行动才得以协调。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是孤

立封闭存在的，总和其他民族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不同民族之间有了往来，语言也随之产生了接触。因此，语言接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语言接触研究的回顾

语言接触研究的源头，应该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对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最初是 W.D. Whitney 1881 年对语言变化中借词的作用进行的探讨。对语言接触有意识的研究是 19 世纪末期开始的。在近代世界史上，19 世纪是殖民主义疯狂扩张的时期，由于语言融合的加剧，混合语随之产生。面对当时出现的语言现象，语言接触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欧美有的语言学家则认为，混合语是不规范的欧洲语，是语言中的不良产物，这一研究没有学术价值。连结构主义的大师布龙菲尔德也持这种看法，认为这类问题不值得研究。^① 但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在这块荒原上，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西方开始出现拓荒者。德国语言学家、克里奥尔语研究奠基者 Hugo Schuchardt 从 1880 年起对语言接触的复杂状况进行了考察，发表了以《克里奥尔语研究》（*Keolische Studien*）为题的系列论文，研究语言接触中出现的众多问题。

与 Schuchardt 差不多同时进行混合语研究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学者，如荷兰的 D.C. Hesseling，丹麦的 O. Jespersen 等，他们也写了不少文章讨论混合语的生成、发展与消亡。20 世纪 30 年代，语言接触研究中心从欧洲移到了美洲，语言学家已不再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纸上谈兵，而是进行实地语言调查。1953 年，Weinreich 发表了《接触中的语言》（*Language in Contact*），Haugen 发表了《挪威语在美洲》（*The Norwegian Lan-*

^① 参看石定栩：《洋泾浜语及克里奥尔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国外语言学》1995 年第 4 期。

guage in America)），这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接触研究的开始。^① 60年代至70年代，研究内容又转为以本国语言为主，例如美国语言学家开始研究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的语言接触现象。70年代和80年代是语言接触研究大发展的时代，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如雨后春笋，至此，语言接触研究成了语言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90年代，国际上还成立了一个“语言接触研究协会”，每年开一次会，对世界各地的语言接触新问题进行讨论。从80年代以来，讨论的焦点集中到了双语问题研究，希望通过双语现象的分析，能对语言规划、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个人的语言学习和外语教学提供帮助。

虽然有不少人研究语言接触问题，发表了不少论著，但就语言接触作系统论述的不多。较有影响的是 Appel 与 Maysken 合著的《语言接触与双语》（*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作者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对语言接触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分析，并认为语言接触必然导致双语，因而语言中的变化都应该从双语着手进行研究。作者还认为，分析语言接触不会有统一的法则可依，因为语言接触中的同一问题可能会因视角不同、研究方法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作者在书中列举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的事实加以说明。

在我国，语言接触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引起关注的。早在50年代中期我国就开始对全国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在调查中，普遍重视语言的相互影响，并把语言相互影响的各种特征记录在调查报告中。后来连续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都提到了有关语言接触的具体事实。1984年，喻世长先生发表了《应该重视语言互相影响的研究》的重要文章，比较全面

^① 参看 Appel and Maysken: *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 London, 1997。

地阐述了开展语言相互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和研究方法。1986年，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研究所开展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的课题研究，并于1988年主办了全国性的“语言关系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的论文编成了《语言关系与语言工作》一书，于1990年出版。在这本论文集里，论述了语言关系的概念、内容及我国语言关系的特点。同年还出版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研究》，书中对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中的许多现象作了分析，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又于1992年连续出版了《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该书较全面地阐述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探索了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还对语言转用，以及少数民族语对汉语的影响作了研究。^①但是，80年代以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对语言接触事实的发掘，并未从理论与方法论上进行探讨。直到90年代初，随着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加上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传入，普遍涉及到了语言接触，方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开始重视对语言接触进行理论、方法的研究，出现了一些专著和论文。如，陈保亚先生对德宏汉族和傣族进行追踪调查，出版了《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一书。作者从傣语和汉语西南官话的接触入手，不为传统的理论所束缚，考察了汉、傣两种语言的接触机制和过程，总结出了匹配、回归、并合、母语转换等一系列新的、前人不曾涉及的理论与方法。徐思益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疆维吾尔语与汉语的接触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查，出版了《语言接触与影响》，就维吾尔族学习汉语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这些论著虽然对语

研究比较零散，大多是孤立地对某一种现象进行研究，且集中在语音和词汇上，对语法的关注不够。在语言使用功能方面，对语言兼用论述的文章较多，而对语言转用的研究却很少。更没有对一种语言由于语言接触产生的变化做过连续、系统的分析。而且从总体上看，语言接触的描写较多，解释较少；表层分析较多，深层挖掘较少；语言事实罗列较多，理论归纳很少。

近年来，双语研究更是风起云涌，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中央民族大学于 1999 年 8 月还召开了“首届国际双语学研讨会”，对双语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对外汉语、对比语言研究、港澳地区的双语教育与普通话推广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国民族双语学会也召开了双语教学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这些都反映了当今学者对现实双语社会的理性思索。

二、语言接触的类型

语言接触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语言本身，还涉及到社会因素、民族关系、自然环境、宗教信仰、人口分布以及经济状况等等，所以语言接触的类型可以根据不同的角度作不同的划分。

1. 从方式上，可分为自然接触与非自然接触两种。^① 自然接触是指使用者自然接触而产生的语言关系，一般是通过口语这一途径产生的。非自然接触是指非口语接触，也称间接接触，例如古代日语与汉语的接触是间接接触，是通过文字传播或文献翻译等途径进行的。又如现今由广播、电视等媒体的传播所引起的语言接触也属间接接触。

2. 从时间上，可分为历时接触和共时接触两种。一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会与多个民族接触，形成一个连续体。尤其在古代，由于生活所迫，各民族不断迁徙。在迁徙过程中，免不

^① 参看陈保亚：《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

了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民族发生接触，这就是历时接触。而取某一时期语言之间所发生的接触，则属共时接触。历时的研究，能看到语言的变化；共时的研究，能看到语言的联系。

3. 从程度上，可分为表层影响和深层影响两种。语言关系的状态是由民族关系的特点决定的，由于民族关系不同，交往有深有浅，时间有长有短，因而语言影响程度也不大一样。从语言结构看，如果只影响到语音、语法、词汇等表层结构的为表层影响。随着影响的进一步加深，还可能触及到语义、语用、语言风格等深层结构，甚至还可能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是深层影响。

4. 从结果上，可分为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发生接触后，使用者某一方总会感到有必要使用对方语言直接进行交际，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学会了另一民族的语言，并且根据不同场合进行交替使用，这就是语言兼用，也叫双语现象。这是语言接触的产物。有的民族兼用另一民族语言一段时期后，可能部分或全体民族放弃母语而转用另一语言，这种现象称语言转用。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是语言接触不同层次的表现，语言兼用是在语言转用之前实现的。

5. 从范围上，可分为个人接触和社会接触两种。单个人选择使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属个人的语言接触。如果整个社会双边发生语言关系，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这种情况便是社会性的语言接触。个人性的语言接触一般对语言演变不起太大作用，而社会性的语言接触则对语言演变起着重要作用。Appel 和 Maysken 在《语言接触与双语》一书中，把社会性的语言接触归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两个语言集团各自使用自己的语言，语言接触分别由各个集团中的部分双语人完成（如图 1）；另一种是两个语言集团的成员都是语言接触的对象（如图 2），即都是双语人或多语人，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多语国家或多语地区；还有一种是一个集团为单语使用者，另一个集团为双语使用者（如图 3）。第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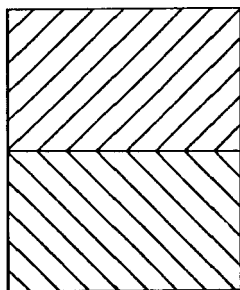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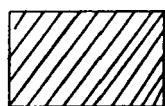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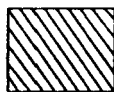


图 1



语言 A



语言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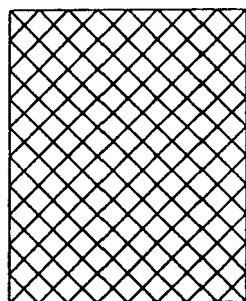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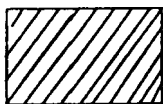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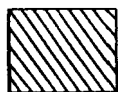


图 2



语言 A



语言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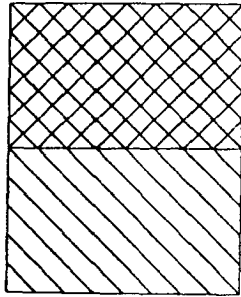


图 3



情况的语言接触在我国最为普遍，汉族一般为单语人，少数民族一般除使用本民族语外，还兼用汉语。

6. 从方向上，可分为单向影响和双向影响两种。语言的选择有一定的方向性，当两个民族的发展水平均衡或人口数量差别不大时，容易出现语言相互影响，这是双向影响。如果一方的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或人口数量明显高于另外一方时，语言影响通常是就高不就低，也就是说，语言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不发达民族受发达民族语言的影响大。语言的兼用、转用通常也是地位低、发达程度低的民族兼用、转用各方面高于自己民族的语言。这属于单向影响。

7. 从语言上，可分为亲属语言接触和非亲属语言接触两种。发生接触的语言如果在发生学上有渊源关系，属亲属语言接触；反之，则为非亲属语言接触。在多数情况下，亲属语言之间的接

触给语言结构带来的变化会较快、较深。非亲属语言间的接触也会给语言结构带来变化，但通常速度会更慢一些，常表现在词汇层，不容易影响到语法层。

8. 从数量上，可分为单语接触和多语接触两种。一种语言如果仅仅与另外一种语言接触，除母语外，双语人仅仅兼用一种语言，这种类型属单语接触。而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民族杂居区，不同民族交错杂居，语言现象十分复杂，一个民族中不同的人往往兼用不同的语言，而一个人除母语外也可以兼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这种情况属多语接触。

由于民族特点、语言特点的不同，加上语言接触的背景、方式等各有不同，因而，语言接触类型界线不会是截然分开的，常常出现交叉。语言接触类型的复杂性，必然使得语言接触研究出现内容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三、语言接触研究的内容

语言接触是引发语言变化的重要原因，既带来语言结构的变化，又带来使用功能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语言外部的各种社会因素决定的。因而，语言变化的状况和制约语言变化的因素是研究语言接触的主要内容。

(一) 研究由于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特点、语言功能的变化

语言接触一般要发生以下三种变化：语言影响、语言兼用、语言转用。语言影响是语言结构的变化；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是语言功能的变化。三者的特点各不相同。

当语言发生接触后会引起语言的变化，最初的变化就是语言影响(language influence)。语言影响主要体现在词汇、语音和语法上。

在这三者中，词汇是反映社会最为敏感的部分，也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层面。两个民族交往，尤其是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交往，总会从先进民族那里获得新概念、新思想，随之借用了一

批批词语。词汇的借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必然反映。考察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几乎没有不向汉语借词的，有的语言借用率还特别高。随着借词的增加，语言影响还会触及到语音、语法层面。

语音影响主要体现在增加新的音素和新的音节结构上。有些借词的音位在母语中没有，一般都会采取相近的音素替代。如果没有相近可替代的音素，则往往要增加新的音位。例如藏缅语的许多语言没有 f 音，语言接触后，增加了这个音位，如景颇语、哈尼语、阿昌语等现在都有这个音。另外，在有声调语言中，声调也可能借入或增加。阿昌语过去没有 51 调，该调只有在变调时才出现，而现在随着汉语借词的大量增加，51 调得到了加强，成了实实在在的调类。无鼻音韵尾的语言，受到别的语言的影响，有可能借入鼻音韵尾，使音节结构类型中增加元音加鼻辅音韵尾的音节结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语言影响一般不会导致一种语言的语音发生系统性变化。

在语言接触中，各民族的语法体系也并不是完全自我封闭的，只是发展速度比较慢。随着语言接触的加深，语法也会受到影响。例如，土耳其语原先定语从句中并无关系代词，因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增加了关系代词 ki（类似英语中的关系代词 that），使得句子关系更加清晰，语义更加明了。接触中的语言，尤其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借用另一语言资源的可能性就更大，其中也可能包括语法的影响。阿昌语原本虚词不发达，与汉语接触后，吸取了不少汉语的虚词，增强了本族语的表义功能。

语言接触除了在结构上会给语言带来变化外，还能导致使用功能上的变化。功能变化最显著的特点体现在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上。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是语言接触中语言变化的不同层次。一般而言，语言影响在前，随之可能发生语言兼用，继而才可能产生语言转用。三者是一个连续体，有其必然的因果

关系。若无特殊原因，一般不会出现跳跃发展。当然，不一定每个民族的语言接触都要走完这三步。其中，语言影响和语言兼用（兼用人数可多可少）是普遍存在的，而语言转用不一定会发生。

语言兼用也称“双语现象”（bilingualism），是语言接触中的必然产物。由于民族的接触或语言的接触，说话人掌握了对方的语言，并使用对方的语言与对方进行交际，语言兼用就产生了。在我国，语言兼用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1）少数民族兼用汉语型；（2）一种少数民族兼用另外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型；（3）汉族兼用少数民族语言型。研究语言兼用，必须研究语言兼用的类型、范围、特点。

语言兼用发展到一定时期，有的民族或一个民族的部分成员会主动放弃使用母语而转用其他语言，语言就从兼用发展到转用时期。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从范围上分，有整体转用、主体转用、局部转用三种类型。局部转用指一个民族的部分地区或部分人发生语言转用；主体转用指一个民族的大部分地区或大部分人转用另一种语言；整体转用指一个民族全部转用另一民族语言。局部转用在各个时期各个民族中都有发生。若持续发展到一定时期就造成主体转用，若再持续发展下去就导致整体转用。一个民族一旦整体发生语言转用，也就意味着一种语言的消失。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时有语言转用发生。一般而言，一个民族转用其他民族语言的现象多为自然接触而产生的，都有其转用的必然原由。但在语言史上，使用强制手段迫使一个民族转用其他民族语言的现象虽然也存在过，但更多的是自然接触的结果。研究语言转用，同样必须研究语言转用的类型、范围、特点。

（二）研究引起语言接触的外部因素

语言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变关系，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起语言的变化。语言接触与社会的关系相依相伴。语言

接触研究自然离不开与语言有关的社会探讨。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括很多组成部分，诸如社会制度、人口、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等。研究语言接触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民族关系因素

语言属于民族，语言接触是由于民族的接触引起的。“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常常表现为语言与民族的关系。”^①因而，民族关系问题对语言外部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民族的语言使用和发展。和谐、平等的民族关系能够带来频繁的语言接触，语言影响就大，速度也就会快些，也可能出现自然的语言兼用，甚至语言转用。民族关系发生变化，语言关系也就自然发生变化。而且，语言与民族的其他一些特征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民族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民族之间的交流情况等都会在语言上有所反映。“民族关系的状况决定着语言关系的方向和特点，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往往制约语言关系变化和发展。”^②

从历史上留下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我国早就存在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和转用现象。如《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载的《白狼歌》是用一种古藏缅语记录的，但其中也夹杂着不少汉语借词。魏晋以来进入中原的匈奴、氏、巴、羌等民族，由于实际生活的需要，与汉族友好相处，不少人学会汉语，出现了语言兼用；回族7世纪中叶迁入中国后，散居各地，与当地民族，特别是汉族生活在一起，逐渐转用了汉语。如今，从汉语及各少数民族

参见戴庆厦：《社会语言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② 参见戴庆厦主编：《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族语言中都能看到民族关系给语言带来的变化，例如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一些彝族杂居村的汉族都会讲彝语；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锡伯族大部分都兼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种语言；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解放前主要受缅语、傣语的影响，吸收缅语、傣语的大量词语，解放后，民族关系发生了变化，后来主要从汉语中吸收借词。

2. 人口因素

语言接触中人口的数量对语言的使用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口多的民族，其语言相对容易保存。人口少的民族，语言消失得相对快一些。从一个国家来说，非主体民族的语言容易受到主体民族语言的影响，也容易兼用和转用主体民族的语言。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无一不受汉语的影响；美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无一不受英语的影响；缅甸、泰国等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从地区上看，人口少的民族语言很自然地会受到地区性人口多、经济文化发达的主体民族的影响。我国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语言都受到当地傣族语言的影响。在户撒乡，阿昌族人口占的比例大，其他民族包括汉族，都有不少人能兼用阿昌语。

3. 文化因素

文化接触对语言的变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早期由于战乱、灾害、远征等原因，历史上的迁徙和移民时有发生。这些原因都会导致不同文化的群体的重新组合，这种重新组合必然增加异族文化群体之间的接触，从而导致语言影响的加剧。由于交际和适应新文化的需要，至少会产生由于不同文化接触而出现的借贷现象，同时也避免不了语言兼用以至语言转用的发生。满族入关以后，受到汉文化影响，首先是满语中吸收了不少汉语文化词，这在清代《御制清文鉴》中得到了反映。随着清政府对汉文化的大力倡导，汉文化影响日益增多，满语的社会功能减弱，最终发生

语言转用。在人类跨入 21 世纪后，由于信息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加快，民族间、地区间、国家间的交往会更加密切，文化的接触会更加频繁，语言将受到更多的文化影响。

在文化的影响中，宗教是一个对语言影响有着特殊作用的因素。宗教的传播、变异，对语言的发展、变化及其使用功能都会产生影响。由于佛教传入我国，汉藏语系的不少语言都受到影响，在词汇系统中吸收了大量的佛教词语。又如，苏丹的官方语言虽是英语，但使用的人数并不多，一半以上的人则使用阿拉伯语，其原因是他们信仰伊斯兰教。^①

4. 地理位置及民族分布因素

地理位置与民族分布也是发生语言接触的一大外部因素。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心城市的居民大多是主体民族。离中心城市越近的少数民族，语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越大。因为他们拥有更多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其语言转用等情况也较边远地区更容易发生。交通发达与不发达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接触同样有影响。交通发达的地区因与外界来往多，语言接触的机会多，兼用、转用的概率就高。

再者，民族的杂居和聚居对语言接触也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杂居区的语言影响大，转用主体民族语言快，而聚居区相对较慢。有人对美国唐人街和其他地区的中国移民进行过调查，发现杂居在美国人中间的华人第二代转用英语的人数比聚居在唐人街的华人高出几乎一倍。^②

5. 婚姻家庭因素

族际婚姻和混合家庭与语言接触的关系已越来越受研究者的重视。从我国的情况看，异族通婚大多是男女双方中的一方得学

① Whiteley W. H.: *Language Policies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 Fishman 1974.

② Martin D: *Language Choice*, the Netherlands, 1995.

会另一方的语言，通常是女方学会男方的语言。第二代的语言往往以母亲的母语为母语，也有的是以父母双方的语言为母语长大的双母语人。但到今日，族际婚姻家庭的子女使用汉语的越来越多，夫妻双方使用第二语言——汉语，下一代也自然使用汉语。在欧洲调查结果也表明，居住英国的不同国籍的欧洲人结婚后，虽然父母大部分不是英国人，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孩子都使用英语。^①

6. 民族心理因素

语言接触中的心理因素往往表现在语言态度方面。语言态度是一定的社会语言环境的产物，是人们对语言使用价值的看法，不同的语言环境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语言态度。人们对一种语言的态度往往建立在前面所谈的社会因素之上。语言态度存在于人们心里，并时刻影响着人们对语言行为的选择。语言毕竟是人们交际思想、传达信息的工具，因此在人们接触另一语言时，必然会先对语言有一个估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由于各方面的具体因素不同，向往的方面不同，语言态度完全不同，对语言的取舍也各有选择。同一民族同一地区，不同的人限于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年龄、性别等差异，语言态度也会各有差异。

（三）研究与语言接触有关的对策

语言作为民族的象征和标志，已成为民族争取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都面临着制定与语言接触有关的对策问题。“如何处理好各种语言（包括大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文字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种语言文字的作用，不但关系到各个民族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国家的长治久安。”^②语言规划的制定，不仅关系到语言的健

^② 参见道布：《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载《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

康发展，而且还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定。因而，制定出正确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是语言接触研究中的必要部分。

语言政策既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建设性的语言政策能促进国家政治社会的稳定和谐，扩大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而错误的语言政策却会给语言的发展带来灾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坚持民族平等政策，为推动语言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民族语言得到了繁荣发展。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整整20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文革”的冲击，民族语文的发展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当今社会，各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语言政策能取得建设性的成果，但良好的愿望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因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往往有不同的内容，因而应当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制定不同的政策和规划。不能“一刀切”，否则就失去了制定政策的意义。如果把语言的有关政策和规划看做“大环境”，把其他社会条件，诸如民族关系与语言关系、人口数量、教育水平、文化观念等看做“小环境”的话，那“大环境”应为“小环境”服务，“大环境”的制定要以“小环境”为基础，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为了维护各民族语言的健康发展，避免语言污染和退化，在语言规划中还要注意语言规范化问题。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词术语大量涌现的今天，如何制定新词术语规范，已提到日程上来了。

综上所述，语言接触研究的内容是一个系统，是一个网络，更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研究内容有许多已超出语言学的范围，既包括民族之间的语言，也包括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以及心理等方面的关系。这其中有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诸学科的知识。概括来说，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1. 研究语言接触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义、语体等，其中又含借用、替代、混合等。

2. 研究语言接触对语言使用功能的影响。包括语言功能的变化和转移，其中主要有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

3. 研究语言接触中的社会因素。包括民族地位、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关系、人口、婚姻、宗教信仰等。

4. 研究语言接触中的心理因素。包括语言识别、语言态度、语言取向、语言使用动机等。

5. 研究语言接触带来的与语言使用有关的问题。包括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双语教育等。

上述各项内容都是语言接触网络中的组成部分，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单独研究某一部分都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完整的，必须整体考虑，整体把握。

四、语言接触研究的意义

语言接触研究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从理论上说，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致力于语言内部规律的探讨，以认清语言内部规律为最终目的，而对语言外部的影响一般不予重视。在揭示语言内部规律时不大注意区分语言变化是由语言内部因素的作用引起的，还是由外部因素致使的。这种忽视语言外部影响的研究方法不可能对语言变化有科学、全面的认识。例如，对汉藏语中的壮侗语与汉语有无亲属关系，长期争论不休，其原因固然与该问题的复杂性有关，但忽略从语言接触上去研究，不能不是其原因之一。近期有的学者从语言接触的新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除考虑语言本身演变的因素外，还考虑语言接触这一外在因素，重视区别同源词关系和借用关系。结果发现，语言影响可能导致语言的质变，被影响语言与影响语言有机地进行沟通后，会形成亲缘关系。“藏缅语与汉语，貌异则源近；